

摇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张一兵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摇Ⅰ援马...摇Ⅱ援张...摇Ⅲ援历史唯物主义原研究
摇Ⅳ援月蒙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01) 第 001111 号

丛 书 名 摇新学衡书林

摇摇摇摇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著摇摇者摇张一兵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摇摇址摇南京市汉口路 圆园号摇邮编 圆园园圆猿

电摇摇话摇 园缘缘缘缘缘缘缘 摇 园缘缘缘缘缘缘缘 摇 传直 园缘缘缘缘缘缘缘

网摇摇址摇澳:辅费障舞躁寝怎援酃

电子信箱摇炆怎藿聃岳惹遭罾瓿颛璩糟吐

经摇摇销摇摇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摇摇刷摇摇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摇愿园尹园园员捷摇印张 员远藏豫摇字数 源园千

版摇摇次摇摇圆缘年缘月第员版摇摇圆缘年缘月第员次印刷

陽月星苑原精緣原園隴園懷原興耕，園苑

定摇摇价摇摇猿摇摇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此书献给我敬爱的母亲——黄灵芝

内 容 提 要

本书指认的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现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中历史辩证法逻辑主体向度的重要内容。可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这一重要的科学批判话语却一直为人所忽略。本书作者在对大量经典文献的精心研读之上,重新提出和确证了这一重要学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并非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在人类社会实践功能度的特定水平上,社会历史发展才呈现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历史现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人类主体畸变为外部力量(自然和人的物化世界)的奴隶,而社会历史发展则外化为一种近似于自然历史运动的“无主体过程”;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似自然性与物役性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将最终超越这一历史性生存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前时期(必然王国)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时期(自由王国)。作者还在当代思想史和自然科学观的理论视角上,特别是结合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实践,论说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现代意义。

本书立意新颖深刻,在思想原创与文本互动、史辨与论说、逻辑深入与生动浅出,以及理论研讨与现实反观等方面均有较为上乘的着墨,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不多见的探新之作。

粵豐源號轉售

[illegible]

第二版自序

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最大的欣慰莫过于看到自己的思想得到关注,或者说知道还有人需要了解它、批评它。得知这本完成于1994年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能够再版,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回想起来,十多年前动手写这部书稿时,我正处于“回到马克思”思想实验进程的中期。那时,固然已经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读了不止一遍,并且也在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的文本学研究中初尝了甜头,可是,我既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最新的资料群,也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性解读方法。尽管信誓旦旦要“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也在马克思关于自然历史过程理论方面有一些专题性的见解,但从理论构架的深层看,我的理论话语最终还是濡滞在旧体制之中的。这可能就是波兰尼所说的焦点意识与支援背景上的隐性悖结。要讲清楚这一点,我得先对自己哲学理论思考与研究历程做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人们或许记得,20世纪末,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呼应,国内哲学界也努力试图摆脱那场全面的浩劫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阴霾。出于对“文革”时期“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满,不少学者要求从“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斗争哲学’”回到“文革”以前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去,这算是一种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场地廓清。可是不久,1984年,在桂林召开的“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讨会上,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俞吾金、吴晓明等七位青年学子递交了一份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振聋发聩的问题:我们一度认为绝对正确、并试图“回到”的所谓“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一个凝固化的体系?面对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和现代西方哲学,它本身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地向前发展?这一在传统惯性思维之外的提问,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学者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1984年代初中国哲学理论界的一大“事件”。尽管后来事件的结束在人们的期待视域之外,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种新的思考发生的契机。

另一件在我思想深处产生巨大触动的事情,可能要算1985年前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牵头举办的几期轰轰烈烈的关于“哲学现代化”的讲习班了。这次讲习班主要有三轮,从北京一直办到了外地。参加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中国哲学理论界的中青年学者。当然,这里的“哲学现代化”是特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背景与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的“三个面向”有关。课程基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首都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担任主讲。讲座的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当时的一些重要发展。在为期不长的学习过程中,每一次讲座的开场白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样一种极端的言说:“三十年一贯制的苏联斯大林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改革发展。在面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哲学应当现代化。”事实上,贯穿所有讲座的中心意图和操作路径仍无非是在原有的理论体系中注入一些新的概念。然而,这种做法在当时却是极具革新意义和理论魅力的。

正是在这种双重冲击影响下,我也曾一度立志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现代化”。当时,这至多是一种外部压力所致的臆念副现

象。

首先,我认真关注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现代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的讨论,并热衷于将诸如系统论、复杂性科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新观点与“马克思”(实际上是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诠释结果)的基本原理作一种有机嫁接的“马克思当代化”的尝试,而且也发表了一批制造了“实践场”、“实践格局”、“实践构序”、“实践功能度”等很多新名词的文章。但是,越往下做,我就越感到了理论维度开拓的艰涩。这种困难并非来自技术的原因,而恰恰因之于自己作为现成基础的“马克思”开始动摇。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处于“在手状态”的马克思的理论话语,并不能真正在逻辑深层与已经发生深刻质变的当代自然科学直接联结起来。这种理论逻辑上的困窘,使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原有的那个我们坚信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体系哲学。我必须贞定,马克思的理论是不是真出了问题。这当然无异于对自己脚下理论土地的坚实性提出了怀疑(而我也深知,这一怀疑一旦得到确证,便会宣告学统内言说马克思全部传统基础的非法性。这无论在我还是在其他学者、特别是那些一生为之奋斗的理论前辈,都将是一个一定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事实总会以它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展现出来,哪怕这种方式本身对于它的承受者来说是如此的无情)。

经过深入的研究,我发现,在自建国后至当时的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话语范围之内,被我们继承下来并已经中国化了的前苏东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正确性,或者,至少其基础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未被证明的预设。在人们的心中,马克思理论的大厦在(拥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苏东学者那里已经建造完毕,我们要做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在这一构架中增添些中国特色的内容,进而细化和补充具体环节而已。而今天所谓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与现代化,也就是将这一现成体系哲学的基本原则与自然科学新概念、西方当代哲学文化进行外在的拼接罢了。于是,在这种

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就常常会表现为某种现成体系内部子结构重组加新概念的赝品复制过程。然而，在理论逻辑上无证自明的前提有时恰恰是最值得提问的。我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不真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简单向前发展的“当代性”问题。从过去那种教条主义的成见去发展，无论它的结合对象是最新的自然科学、西方哲学、当代社会思潮还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其结果必然是或者生出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或者从根本上绕开马克思主义。用这样一种东西去充当马克思主义真理以指导改革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坚信，要真正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理论新问题，首先就必须有一个对马克思历史视域认真真正本清源的过程，这也是这些年我突然“回到马克思”原初的动因。

其次，更重大的打击是我在自 1984 年代中后期开始涉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时遭遇到的。尽管在 1990 年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南京出版社）的小册子，但那却是我更为浓重的理论不安的发端。在那本书中，我俨然一副站在马克思正确立场之上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面貌，论说他们的种种不是。但是，在内心里我却已深深地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困窘。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而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我曾经指认过：“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罗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44—1845 年经济学手稿》的

认知,而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①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仅着眼于他们显性的结论,是很难准确判定其是非对错的。所以,我已经内省到自己这种“批判”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进而认为,关于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视域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这同样需要我们完成“回到马克思”的历史任务。

其三,为了避免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我们也还有一个逃脱的选择,就是简单地宣布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在不对马克思哲学理论历史地平进行廓清的条件下,独立地构造一个个新的体系哲学,然后站在这个体系范围内自说自画,而不去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当代的世界文化进行“短兵相接”的交锋。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欺其人的做法。表现在自己的理论实践中,这就是一度我也肯定的“实践唯物主义”。尽管在我后来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仍然很深地受到体系哲学影响的不成功的作品,但当时却着实让我欢欣鼓舞了一阵子,并不遗余力地为其大唱赞歌,宣称“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在如何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伟大的革新。可很快我就察觉到,即便在同一个建构“实践唯物主义”的口号下,不同论者要表达的理论倾向其实大相径庭。更有甚者,人们可随心所欲地建构各种各样的新体系,诸如“人学”、“类哲学”或者“实践人本主义”,并直接将这个体系哲学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我的问题是:这种指认是否有真实的根据?或者不肖说只是假马克思的名义言说自己的哲学观念?这个自省足以使我不再进行制造这一类“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体系哲学之理论僭越。

① 拙文：《深度解读：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10期。

至此我已经充分自省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还是不深入和不全面的。要能够和“当代”对话,能够把马克思推向当代,能够以一种正确的立场回答和解决新问题,需要完成的一个历史性任务就是重新廓清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地平。尽管我已经预料到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理论工程,可是,后来的事实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

1990年代末,我开始系统地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但在开始撰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理论工程的独立思考道路,虽然我已经明确拒斥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但更吸引我注意力的仍是具体的理论观点论争,而非新的解读方法和异质性的研究视域(这一点是在后来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才实现的)。^①具体些说,我关注的焦点还是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为我所注意到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即在对马克思社会自然过程理论的传统理解中存在着某种重大的理论误释。明明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时,对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自发经济社会现象(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力量成为支配人类主体的主导力量这一历史情形),都是在否定和批判的语境中指证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异常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期冀着在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之中,将有可能扬弃这种特定的主体与客体“颠倒”的历史现象。可是,到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特设的理论观点却被误释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所谓的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就被错误地诠释为全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状况,由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被解释成一个不以人类主体意志为转移和臣服于社会中“自然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同

^①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时,我又发现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中,围绕着社会发展问题正好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即从青年卢卡奇一直到萨特的人本主义流派与从阿尔都塞一直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流派。前者是所谓从主体出发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则具有从客观规律出发的实证理论倾向。在这两种极端的理论观点中,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被“一分为二”,或是仅仅强调主体性和批判性,或者单单凸现社会存在中的客观决定因素,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独断论式的逻辑对峙。

针对这种理论困境,我当时的理论目标就被设定为寻求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完整视域:即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又能在此基础上重新高扬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精神。用我当时的提法就是:“既科学说明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又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和客观必然性。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应该是由历史地肯定人类主体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与坚持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统一。”同时,为了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主体观,我将自己的理论努力狭义地确定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其中,我原创性地提出了似自然性理论与物役性理论,并分别从发生学历史研究、专题研究等多重视角讨论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现在看来,似自然性理论与物役性理论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论辨识。因为通过似自然性与物役性范畴的确立,我才得以校正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重要论见的严重误释,同时也力图将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片面分裂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两极的历史辩证法重新统一起来。应该说,这一理论努力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必须指出成问题是:第一,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还是不成熟的。虽然在第一、第二章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演进的描述中,我也有一定的历史性分析和文本解读,可这还是不

完整、不规范的。第二,我尚没有掌握 ~~苏联~~ ^{苏联} 最重要的新资料,特别是与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转换的真实语境有关的大量经济学笔记。第三,在对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理论的分析研究中,我仍然耽迷于后来自己明确批评过的同质性专题“撮合”法。这都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批判性甄别对待的。如果有可能,将其与我的后一本书,即《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起参阅,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次再版,我完全保留了该书的历史原貌,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少许润色,纠正了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重新校正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吴雨芳老师和我的学生吴静、蒙木桂参与了这一工作,在此对她们的劳动表示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此书是由他们于 ~~1983~~ ¹⁹⁸³ 年首版的。同时,也要衷心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是作为本书编辑的黄继东老师,是他们的辛勤努力才使此书有机会得以再版。

应该说,能看到两个世纪交替的人是幸运的,而能遭际一个千年更迭的人是幸福的,可我们居然同时拥有了这两种机会。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感叹自己有限生存中的可贵吗?在这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里,让我们共同努力,以证明自己作为东方思想者的真在。

张一兵

2004年 04月 16日于武昌何家垅

序

从大约一百五十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围绕着它的争论就几乎没有间断过。赞同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自不必说,就是在赞同者这一边也始终没有达到过理解上的一致。不过,各种分歧之间,其情形和性质又不一样。有些分歧是正常范围内合理的分歧,彼此间虽有是非,但并不掩盖在基本取向上的一致。这一类分歧是大多数,属常见的。而另一类分歧则超出了上述的合理范围,分歧的一方或双方,于有意无意之间,在争论中渐渐地拉开和扩大了立场上的距离,以致在基本取向上形成公开的对立。这一类分歧是少数,不常见的。对于前一类分歧,我们应取的态度当是:宽容以待之,虚心以受之,以便达到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相得益彰的效果;而对于后一类分歧,我们应取的态度则当是:务必分清是非,绝不在基本立场上求妥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和变化不仅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而且也强烈地受到社会思潮变迁的影响。它经历了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剧烈动荡的变革时期与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它也经历了政治上的进攻时期和退却时期,经历了战略目标的变换和工作中心的转移。而每当面临这种被赋予了时代特征的战略转变时期即将发生或开始实现的时候,就必然伴随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实践的分化和重组,伴随着政治观念的更新与变革。为了促成和解释

这种变革,人们必然会提出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从 1949 年代初期兴起的我国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讨论热潮,就是在这种战略转移时期进行的。当然,就其背景而言,它还受到大量涌入的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必须看到,历史无论怎样迂回曲折,它总是在沿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撤出旧的阵地是为了发展和巩固新的阵地。战略任务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最终目标的放弃,也不意味着要在思想上把先前奉为政治实践原则的那些理论观点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谬误并统统地加以清洗。一切都必须用宏观的变化着的历史的眼光来考察,要更多地面对实际,面对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凸现出来的主要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从而考察成为这一时期主导哲学精神的那些理论原则和理论观念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转折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执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它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历史实践,同时又在人们的历史实践中丰富、改造和发展着自己。不过,这种发展不是要全部地否定过去的历史,更不是要根本地改变它的原则。因此,在面临时代变革,必须大规模地迎接接踵而来的历史的新挑战的时候,率由旧章,保持原有的一套,拒绝作新的探求和适时的变革是不对的,而借口这种探求和变革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或偷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导原则更是不对的。遗憾的是,从我国理论界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两种倾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任何发展都是历史的延伸,但又不是简单的延伸。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充满了曲折和迂回,而且仿佛还有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要放弃已经卓有成效地获得的一切,而是要寻找新起点,以便向更高的目标推进。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在苦难和挫折中曲折发展时说道:“像 19 世纪的革

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目的;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远大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着和上述情境相同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最初文本”,这几乎是当今所有致力于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的共同意向。像上述马克思所生动描写的那样,不惜把事情重做一遍,以便坚决地、更彻底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推向前进,这自然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

回到马克思,回到他的原初作品,是为了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借鉴马克思以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方面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真正本质。通过这种探索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以便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能成功地运用于革命和战争的旧时代,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肩负起历史的重担,这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考的大问题。

张一兵同志的这本著作就是在上述思想背景下积十余年的研究心得写出来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意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但并不忽视它的客体性原则,意在宏扬马克思主义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44页。

学的人文精神 ,但毫不贬损它的科学精神。它反对机械论 ,但坚定地捍卫唯物主义的立场 ;它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性意义 ,但并不否认自然界对于人的社会实践的优先地位 ,并且将永远地保有这种地位。作者广泛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 ,但也清醒地看到并抵制了他们许多基本错误倾向。本书虽侧重于改革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体系 ,但作为全书的落点 ,它对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做了深入详尽的哲学探讨。我相信 ,本书的问世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孙伯极

一九九五年 愿月 愿日于南京大学

自摇序

读过本书的内容提要,不少人的内心里都会有一种深深的震撼:“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马克思说的吗?这不是在批评马克思吧?我这里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这不是批评马克思,而是在纠正我们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某种误释。^①

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辨识的深层理论问题。我想还是从自己在这问题上的困惑与解疑过程谈起。

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专业的研究生时,我的导师李华钰教授主持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讨论。那时,我们必须自己收集资料,就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个问题作一个专题发言。我选的题目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在这个作业中,我没有停留在当时(1984年)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平面上,而是采取了一种历史考察的思路来透视。虽然在这个研讨中,基于对马克思以前历史哲学逻辑起点的分析,我也正确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逻辑起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总还是隐约感到自己的立论存在着某种说不出的缺憾。我先是

^① “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是我用来特指我们传统哲学教科书话语体系的一个特定称谓。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还原与新的理论建构》,载《江海学刊》1993年第1期。